

汤一介

散文集



汤一介散文集

译林出版社

97875447575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汤一介散文集 / 汤一介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447-5753-9

I. ①汤… II. ①汤…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99734号



书 名	汤一介散文集
作 者	汤一介
特约策划	施梓云
责任编辑	胡晓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4.75
插 页	2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753-9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汤一介

著名学者、作家、哲学教授。

祖籍湖北黄梅，1927年生于天津，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当代中国哲学界代表人物之一，出版有哲学专著多种。晚年主持编撰《儒藏》。2014年逝世于北京。

目 录

寻求通往真理的路	1
这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	7
“引蛇出洞”的“阳谋”	13
迷惑的十年	19
到云南与父亲团聚	27
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39
在燕南园随父亲读书	59
记我的母亲	75
我们家的儒道互补	81
人生要有大爱	87
从沙滩到未名湖	91
生活在非有非无之间	99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105
自由的层次	111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117

小议“以德治国”	123
平等对话才能相互理解	129
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	135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139
汤用彤与熊十力	145
生与死	153
中国的“老天爷”	191
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中国文化	223
“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275
在有墙与无墙之间	299
论儒家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	309
论“情景合一”	335
“孝”作为家庭伦理的意义	347
《世说新语》中的“七贤风度”	357

《道德经》导读	379
“人间佛教”之意义	413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讲义	425

寻求真理是困难的，不仅要有智慧，而且要有勇气。对真理的探求只能靠你自己，正像《圣经·马太福音》中所说：“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1949年前，我选择了学哲学，目的就是在寻找真理，探讨人生的意义。1949年社会情况的变化，使我突然感到可能我是错了，真理并不那么难获得。但生活给我一个错觉，好像通往真理的门大开着，路是一条平坦笔直的大道，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掌握真理，只要你能记熟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就行。

在1949年后，我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严格说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开始虽然还有些怀疑，但很快我就把这种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当成了真理。经过了几十年，我才发现原来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门也是窄的，路也是小的，你如果再想往回走，想走出教条主义的门，那是非常困难的，也许人也是很少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虽然其中有些观点是过了时的，甚至

是错误的，可是它中间无疑仍然包含着许多科学的成分，它还是应作为我们学术研究的对象，但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把它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那就必定把本来包含其中的某些相对真理教条化而变成错误了。

1949年后，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百余年来，我们的国家一直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经常受到外国人的侮辱，真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但是在1949年政权改变以后，我首先感到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以不再受西洋人和东洋鬼子的气了，不会再有“沈崇事件”了。这样一种深刻的感受，我想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自愿地或半自愿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这点和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情结是分不开的。第二，在政权建立之初，当时一些共产党的干部是比较廉洁的，比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官员到北京接收，抢房子、抢汽车、抢金条等等腐败现象，从感觉上真是有天壤之别。例如，我初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任教员时，我和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二十来年的校长这样的老革命，住的房子也差不多，吃饭在同一个食堂，他吃中灶，我吃大灶，可是中灶与大灶差别也很小，我们穿的衣服一样，大家抽的烟一样，每月生活费也一样，当时生活虽很清苦，可是上上下下都不以此为苦。当然也许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苏联的电影和小说对广大青年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乡村女教师》所表现的女教师对自己事业的崇高的献身精神；《蜻蜓姑娘》中的那位姑娘对美好生活的乐观精神和开朗的性格等等。当时我读了不少苏联小说，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等，这中间所表现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使我们这些青年人深深地感动了。使我现在还不能忘怀的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1943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这本书我读了好几遍，其中有这样一段：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都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妹妹们；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引者按：古丝妲是伏契克的妻子）；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这种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道主义，为理想而献身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我每读到这里就禁不住热泪盈眶。本来在1949年前，我虽对生活了解很少，但在我的心中，也有着一种潜在的对人类的爱。我记得在我那篇名为《论死》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生命像一盏油灯，它可以照亮人们。有的人希望火光小小，这样可以燃烧得更长更长；但我却愿火光大大，快快烧尽，而使人们得到更大的光明。”这也是伏契克的话深深打动我的一个原因吧！但是在那时，我是悲观的。我那时很喜欢读朱光潜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在该杂志的

第三卷第三期（1948年8月）上，有林庚的一首题为《活》的小诗，开头两句是：“我们要活着都是为什么，我们说不出也没有想说。”当时我觉得林庚对“人生”没有深刻了解，就在这首诗旁边也写了一首诗，共两节，其中第二节：

谁带给我一阵欢乐
难道死亡是痛苦
谁不信
春天死了
来的不是夏日，谁不信
母亲生我
在世界上就要增加一座坟

我在读过伏契克等人的东西之后，好像自己思想突然开朗了，因而觉得自己过去不过是在一个人的自我封闭的小天地中，走不出来。而伏契克他们是真正在为他人理想，为了一种崇高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以至于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他们的事迹的感染下，我很快就投身到为一种“新的事业”中去了。1949年5月，我参加了新民主主义共青团；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希望我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

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一样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了。当时，学校已经开设有政治课，学《社会发展史》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次我读它们就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了，觉得说的都有道理。由于我是哲学系的学生，我们还要学日丹诺夫的《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和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教条长期束缚着我们的头脑。说真话，我当时确实把这些都当作“真理”来接受了。1949年后，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们都还可以开课，例如我父亲还开了“英国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贺麟先生开了“黑格尔哲学”等等，其他系也有类似情况。当时有些同学提出这些课程都是资产阶级的，不应再开设了。在一次由当时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党总支委员会宣传部长许世华主持的北大全体青年讨论会上，有的同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在会上发言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和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斗争中成长的，我们听那些教授讲一点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有什么可怕，反而会在斗争中成长。”我的发言

得到了那位宣传部长的肯定。当时，我除了选修哲学系开设的所谓“资产阶级”的课程，还选修了西语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课程。为了学好“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甚至选了数学系的“微积分”和“数论”，但这两门课都没念完，因为它们对我实在太难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我选修了那么多的“资产阶级”课程，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笔财富，我的知识面比以后培养的大学生广得多，不能不说是得力于这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教授了。

1951年1月，北京大学党总支委员会决定调我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去学习，现在我对当时学的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好像是学“党的基本知识”，大概学了一两个月，就把我留在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当教员了。先是给在学校学习的学生讲“中共党史”，课本用的是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后来我主要教《联共（布）党史》中的第九章至第十二章，即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当时讲课很受欢迎，因为我讲课条理很清楚，这可能也与我原来的哲学基本训练有关。《联共（布）党史》第九章讲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第十章讲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第十一章讲的是“农业合作化”，第十二章讲的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全面胜利和苏联宪法”。我除了为党校学生讲课之外，还给北京市的一些干部讲课。

我既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我都认真地读。不过我读书也还是有所选择的，一般教科书和小册子之类我读得很少，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则很花工夫。在1951年到1956年期间，我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斯大林全集》一至十三卷（当时只出了十三卷），《列宁选集》两卷本，《列宁主义问题》和已出版的几卷《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当然《联共